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工的 户籍与地域歧视

——以上海市为例

章 元 高 汉

【摘 要】由于城市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高于一级市场,农民工在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会低于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文章利用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上海市 10 000 个家庭样本进行了检验,并采用转换模型克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结果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分别比在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地域歧视和户籍歧视低 18.5 和 27 个百分点。上述结论表明,政府应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分别应对不同市场中性质不同的歧视。

【关键词】歧视 农民工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

【作 者】章 元 复旦大学,副教授;高 汉 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一、引 言

现有文献在度量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所受到的工资歧视时,虽然注意到了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而带来的歧视,却很少考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 Doeringer 等(1971)提出,按照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等特征,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两大非竞争性部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一级市场的工资水平较高,就业稳定,工作环境良好并拥有被提升的机会,而二级市场只能提供较低的工资、不稳定的就业和较差的工作条件,并且没有被提升的机会。已有研究提供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具有二元性的明确证据。例如,蔡昉(1998)的调查发现,农民工主要分布在自我雇佣、私人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中,而他们在国有企业中的比重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比重;Meng(2000)利用 1995 年上海市居民和外来人口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如果不存在对于农民工的歧视,他们成为“白领”的比例将会从 3%上升到 9%。

由于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不同,工作条件较好的一级市场对于农民工存在着很明显的进入“门槛”,并且具有垄断性质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几乎都属于一级市场;同时,二级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大多不需要很高的技能或技术,对于拥有较低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农

民工而言,他们大多只能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所以这就决定了二级市场上的竞争程度要高于一级市场。根据 Becker(1957)的研究,如果一个雇佣者仅仅因为歧视而拒绝雇佣一个有生产率的工人,那么他将失去一个有价值的机会,所以歧视对于他来说是有成本的。同时,竞争将会降低歧视,因为有歧视的雇佣者相对于没有歧视的雇佣者将会失去部分市场份额;Becker 还提供证据证明,在一个更多管制、从而更少竞争的产业中会出现更高的歧视。从理论上讲,竞争之所以能够降低歧视,还有一个原因是被歧视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用脚投票”来选择其他的雇佣者,或者竞争会迫使利润最大化的雇佣者消除歧视。因而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理论机制提出以下假说:在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在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要低于在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工资歧视。

现有研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普遍存在两大问题:(1)大部分研究将被调查者的可支配收入作为雇佣者支付的劳动力价格,而忽略了雇佣者和劳动力所缴纳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金(以下简称“三金”),实际上,这些被忽略的部分也属于劳动力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理,个人所得税缴纳数量的不同也会导致可支配收入水平与实际劳动力价格之间产生差异。在研究工资歧视时,应该使用还原了“三金”和个人所得税的名义工资水平,而不应该使用可支配收入水平。另外,由于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在工作小时数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所以衡量劳动力价格的更准确指标应该是小时工资而不是月工资。(2)现有研究大多简单地将劳动力分为两类:本地劳动力与外来劳动力,或者工人与农民工,然后把后者视为被歧视的对象,然而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除了外来农民工以外,也有相当数量的外来工人,在劳动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他们获得的工资水平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很可能也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显然不是由于对农业户籍的歧视而导致的。同样,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还有来自城市郊区的农民工,在劳动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他们与外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可能有差异,而这种差异与对农业户籍的歧视无关。所以,在劳动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由于户籍来源地的不同而导致的本地工人与外地工人的工资差异、本地农民工与外地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定义为地域歧视。所以,研究工资歧视时还需要明确界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度量户籍歧视还是地域歧视。基于上述理由,本文提出扩展的假说:在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在二级市场上所受到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都要分别低于在一级市场上所受到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使用的是对上海市 10 000 个家庭(28 717 位居民)的调查样本。由于 2005 年的人口调查包含了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口,并且调查了他们的就业情况和工资水平,所以这一数据能够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在删除了小于 18 岁大于 60 岁、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来源靠家庭其他成员或社会保障的样本后,得到 12 435 个劳动力样本。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歧视问题,所以首先要划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严善平(2006)曾给出了区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标准,参照

表 1 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划分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专业技术人员；在机关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内工作的全部职工	在私营、个体工商户、私营、其他类型、其他工作单位就业的下列 职业：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 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土地承包者

他的划分标准，本文依据人口普查的信息对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划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根据人口普查所提供的信息，本文对农民工的定义是：农业户籍、户籍登记地不在上海、离开户籍登记地的目的是为了务工经商的劳动力。表 2 提供了两级市场上的劳动力特征的对比。其中，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是指签订了固定期和无固定期限合同所占的比例；人口普查在调查教育情况时，询问了被调查者的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其教育程度折合成受教育年限^①；已婚虚拟变量则包括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离婚和丧偶 4 种情况。另外，由于本文特别关注因为缴纳“三金”而导致名义劳动力价格与可支配工资的差异，我们需要根据每个劳动力拥有的各种社会保险金信息还原出名义劳动力价格。还原方法是：根据上海市劳动局制定的标准，对于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的劳动力，假设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基本养老金为其月平均工资（工资超过缴纳基数的则以基数为准）的 30%，失业金的比例为 3%，医疗保险金为 14%；而对于其他劳动力，则采用基本养老金为 30%、失业金为 3%、医疗保险金为 8%的标准。同时，依据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税率和起征点对税后月收入进行还原。

从表 2 可以看出，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农民工更多地在二级市场上就业，一级市场上劳动力的年龄、受教育年限、男性和已婚的比例都更高；一级市场上签订了劳动合同和拥有各种社会保险的劳动力的比例都比二级市场上的更高，他们的工作时间更短，月平均工资和小时平均工资水平更高，这表明二级市场上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更差。

表 3 进一步提供了两级市场上农民工和工人（非农户籍）的特征对比，从中可以看出：（1）无论是在一级还是在二级

表 2 二元劳动力市场特征的统计描述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工人数量	3496	1483
农民工数量	1082	3021
年龄(岁)	38.97	32.50
受教育年限(年)	10.52	8.48
男性比例(%)	63	56
已婚比例(%)	84	71
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	84	45
有失业保险的比例(%)	71	25
有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	79	40
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	80	43
调整后的月工资(元)	2697.71	1457.88
调整后的小时工资(元)	15.27	7.69
每周工作小时数(个)	43.23	47.61

注：数据来源于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上海市 10 000 个家庭样本；调整后是指将“三金”和个人所得税还原后的工资水平。

① 本文采用的受教育年限折算标准是：未上学为 0；小学为 5；初中为 8；高中为 11；大学专科为 13；大学本科为 15；研究生及以上为 20。

表3 二元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和工人的特征对比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农民工	工人	农民工	工人
年龄(岁)	34.17	40.45	30.33	36.91
受教育年限(年)	7.64	11.41	7.69	10.10
男性比例(%)	68	61	56	56
已婚比例(%)	85	83	68	76
调整后的月工资(元)	1563.33	3048.39	1128.05	2129.78
调整后的小时工资(元)	7.68	17.63	5.56	12.03
每周工作小时数(个)	50.71	40.92	50.10	42.54
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	51	89	32	70
有失业保险的比例(%)	13	89	3	69
有基本养老保险的比例(%)	20	97	15	92
有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	23	97	18	93

注:同表2。

工人的工作条件及待遇也比二级市场上更好。上述统计描述再次揭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和农民工得到的待遇更低的事实。但上述统计描述并不能显示工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歧视导致的,以及在一、二级市场上的户籍和地域歧视分别是多少,下面利用上海市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一) 度量方法

为了度量农民工在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所受到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首先通过回归方程度量歧视: $\log \text{hourwage}_i = \beta_0 + \beta_1 \cdot D_i + \sum \beta_i \cdot X_i + u$ 。其中, X_i 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系列外生变量; D_i 是农民工虚拟变量; β_1 是对农民工歧视程度的度量。

为了分别度量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对于外来农民工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在控制了决定劳动生产率的所有因素后,如果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还比外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那么这个高出的部分就可以度量外来农民工相对于本地工人受到的歧视,由于外地农民工具有农业户籍和外地户籍双重特征,所以这里保持劳动生产率一致情况下的工资差异其实包括了他们所受到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因此,我们将劳动力进行分类(见图1),基于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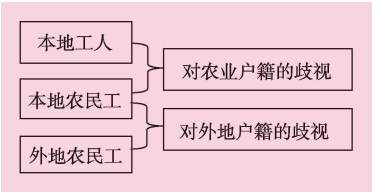


图1 对农业户籍和外地户籍的歧视

种分类可知,在保持劳动生产率一致的情况下,如果本地农民工比外地农民工的工资水平高,那么高出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度量对外地户籍的地域歧视;如果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要比本地农民工高,那么这个高出的部分就可以度量对于农业户籍的歧视。

基于上述考虑,采用不同子样本进行OLS回归。从回归

市场上,农民工拥有各种社会保障和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都明显低于工人,月平均和小时工资也明显更低;(2)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在一级市场上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比二级市场上更好(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他们在一级市场上的每周工作小时数比在二级市场上的每周工作小时数略长);(3)一级市场上

结果(见表4)中可以看出,只有利用本地农民工和外地农民工的子样本进行回归时外地户籍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中受到的歧视比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中所受到的歧视高,而且高出的幅度并不明显。然而这种回归还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在上述模型中,我们直接将不同的子样本根据表1的标准拆分后进行回归,但实际上每个劳动力能否进入一级劳动力市场还可能与其他很多不可观测的因素有关,或者每个劳动力在面临着是否进入一级市场时都存在着自选择问题,所以,简单的OLS回归可能会带来有偏的结果。

(二) 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对于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和转换模型来解决。首先找到外生的、能够直接影响劳动力能否进入一级市场的工具变量,并用工具变量和其他外生变量预测每个劳动力能否进入一级市场,最后根据预测的结果来分别回归两个子市场的工资方程。

本文使用的工具变量包括劳动力户籍所在省份的省会城市到上海市的铁路距离和户籍所在省份的平均收入水平(分别为2004年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纯收入),使用它们作为工具变量的理由一是由于从劳动力户籍所在省份省会城市到上海市的铁路

表4 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方程(OLS模型)

	本地工人与外地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与外地农民工		本地农民工与本地工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农业户籍					-0.251*** (0.030)	-0.278*** (0.026)
外地户籍			-0.289*** (0.051)	-0.207*** (0.025)		
外地农业户籍	-0.420*** (0.033)	-0.521*** (0.023)				
年龄	0.006 (0.007)	0.023*** (0.006)	0.014 (0.013)	0.016*** (0.006)	0.008 (0.008)	-0.000 (0.009)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已婚	0.051* (0.031)	-0.015 (0.024)	-0.010 (0.067)	-0.007 (0.027)	0.062* (0.032)	0.028 (0.039)
受教育年限	0.113*** (0.003)	0.082*** (0.003)	0.084*** (0.007)	0.047*** (0.004)	0.116*** (0.003)	0.095*** (0.005)
男性	0.130*** (0.019)	0.153*** (0.016)	0.187*** (0.036)	0.202*** (0.017)	0.147*** (0.019)	0.143*** (0.023)
外出时间	0.021*** (0.005)	0.033*** (0.004)	0.045*** (0.007)	0.033*** (0.004)	0.001 (0.006)	0.031*** (0.009)
常数项	0.727*** (0.157)	0.554*** (0.113)	0.828*** (0.244)	0.296*** (0.105)	0.811*** (0.164)	0.420** (0.164)
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4545	4493	1522	4080	3915	2543
R ²	0.485	0.447	0.276	0.307	0.397	0.544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距离是一个地理变量,它不会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个人特征,也不会直接影响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但会对劳动力掌握市场的信息产生直接影响,距离越远,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的程度就越低,从而进入条件比较好的一级市场的可能性就越低。二是由于劳动力户籍所在地的收入水平也不会直接影响他们在上海的工资水平,但可以看成是劳动力的保留工资,因而会直接影响他们对工作岗位的选择,比如,假设在二级市场上被支付的工资低于他们在家乡能够获得收入(考虑了交通成本等因素以后),那么他们就会选择回家乡就业,或者选择工资更高的一级市场就业。家乡收入作为一种保留工资,会直接影响他们在上海市的就业选择,但从劳动力的需求方来看,雇佣者并不会根据他们户籍所在地的收入水平来支付工资,而是要根据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工资水平,所以家乡的收入水平在工资方程中是外生的。三是虽然从理论上无法完全排除上述两个工具变量在工资方程中的内生性,但可以进行过度识别检验,表5的检验结果显示,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都远大于10%,这表明这两个工具变量在工资方程中具有内生性的原假设被拒绝,因而满足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另外,由于F值均较高,因而也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从表6转换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乡收入”和“距离”两个变量都在1%的程度上显著,前者的符号为正,后者的符号为负,这说明家乡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劳动力进入一级市场就业,而如果其家乡到上海市的距离越远,则进入一级市场的概率越低,这与理论预期保持一致。其次,将表6与表4进行比较,度量户籍的3个虚拟变量的符号和显著程度没有任何区别,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却发生了变化,这表明OLS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另外,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外出时间等变量在转换模型中均显著,这说明它们对于劳动力进入一级市场的概率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的符号也都符合理论预期。

从表6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使用第一个子样本的情况下,“外地户籍”在一级市场中的回归系数为-33.5%,而在二级市场中的回归系数为-15%,一级市场上的地域歧视要比二级市场上的地域歧视高出18.5个百分点。(2)在使用第二个子样本的情况下,“农业户籍”在一级市场中的回归系数为-43.5%,而在二级市场中的回归系数为-16.5%,一级市场上的户籍歧视要比二级市场上的户籍歧视高出27个百分点。(3)当使用第三个子样本进行回归时,“外地农业户籍”在一级市场上的回归系数也比二级市场中的回归系数更高。但此时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是十分明显,这是可能是因为使用的子样本不同,因而被解释变量的变异程度也不同。所以,基于上述结果可以判断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无法被推翻。

从其他变量的回归系数中得出以下结论:(1)劳动力的年龄与其工资水平基本上成倒U形关系,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工资水平会增加,但到达一定程度后则会拐头向下,这一结果与现有其他很多实证研究的结论保持一致。(2)男性虚拟变量在所有的方程中都显著为

正,这说明男性在所有市场中的工资水平都显著高于女性,这与现有研究的结论也保持一致。(3)受教育年限在

表5 转换模型中工具变量的适用性检验

	本地农民工与外地农民工	本地工人与外地农民工
弱工具变量检验	F=38.92	F=21.76
过度识别检验	p=0.4063	p=0.7377

表 6 农民工遭受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

	本地农民工与外地农民工			本地工人与本地农民工			本地工人与外地农民工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转换模型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转换模型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转换模型
外地户籍	-0.335*** (0.085)	-0.150*** (0.027)	-0.521*** (0.111)						
农业户籍				-0.435*** (0.032)	-0.165*** (0.018)	-0.541*** (0.057)			
外地农业户籍							-0.651*** (0.053)	-0.510*** (0.028)	-0.838*** (0.104)
距离			-0.059*** (0.014)						-0.182*** (0.039)
家乡收入			0.041*** (0.010)						0.031*** (0.010)
年龄	0.010 (0.015)	0.015** (0.006)	0.030* (0.016)	0.016* (0.007)	-0.010 (0.010)	0.029** (0.013)	0.007 (0.008)	0.028*** (0.006)	0.047*** (0.013)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8)	0.000 (0.010)	-0.000 (0.01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已婚	0.088*** (0.007)	0.051*** (0.004)	0.011 (0.009)	0.075** (0.000)	-0.033 (0.000)	0.194*** (0.000)	0.037 (0.031)	-0.030 (0.025)	0.159*** (0.052)
受教育年限	-0.023 (0.095)	-0.040 (0.029)	0.349*** (0.075)	0.140*** (0.035)	0.078*** (0.042)	0.104*** (0.062)	0.122*** (0.004)	0.089*** (0.004)	0.072*** (0.006)
男性	0.235*** (0.067)	0.191*** (0.018)	0.312*** (0.041)	0.218*** (0.004)	0.123*** (0.006)	0.185*** (0.007)	0.167*** (0.020)	0.168*** (0.016)	0.172*** (0.032)
外出时间	0.038*** (0.015)	0.024*** (0.004)	0.063*** (0.010)	0.007 (0.032)	0.026*** (0.032)	0.023* (0.046)	0.023*** (0.006)	0.031*** (0.004)	0.051*** (0.008)
常数项	1.025 (0.772)	0.264** (0.110)	-2.581*** (0.283)	-0.329* (0.185)	0.772*** (0.180)	-3.045*** (0.281)	0.599** (0.244)	0.418*** (0.114)	-2.480*** (0.247)
行业虚拟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		5602			6458			9038	
方程独立性检验		P=0.00			P=0.00			P=0.00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p < 0.01$, ** $p < 0.05$, * $p < 0.1$ 。

大部分工资方程中都显著为正,这说明更多人力资本确实可以提高工资水平。(4)外出年限在所有的方程中都显著为正,这说明外出时间越长,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水平越高,对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是,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时间越长,对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了解程度就会越高,或者他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搜寻工作,以及在不同的工作之间做出最优的选择,这些机制都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提出理论假说认为,相对于一级市场,政府

对于二级市场上的管制更少,就业岗位之间的替代性强,所以二级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比一级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更激烈,从而会使一级市场上对农民工的工资歧视高于二级市场上的工资歧视。本文将农民工的歧视区分为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后发现,一级市场上对农民工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都明显更高。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所受到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都比在二级市场上高,这就意味着政府降低农民工歧视的主要努力方向和政策重点应该放在一级市场而不是二级市场上,更不必笼统地将政策瞄准全部劳动力市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政策执行难度和执行成本。

第二,本文的理论假说、实证检验和分析都表明,提高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程度有利于降低对农民工的歧视,所以,政府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来达到降低歧视的目的,换言之,凡是有助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的政策或措施都可以成为政府降低歧视的可选工具。政府对于某些行业的管制或某些行业存在自然垄断现象,这些因素都会通过抑制竞争而不利于降低歧视。

第三,本文采取的研究策略发现,对于农民工的工资歧视中还包括相当程度的地域歧视,即劳动力市场对于来自外地劳动力的歧视,这一歧视与他们是否拥有农业户籍并没有必然关系。地域歧视与户籍歧视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力量,因而政府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应对不同的歧视。中国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地域歧视也不可能随之消失,对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掌握程度和获得渠道等众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地域歧视,因而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应对地域歧视。

第四,根据本文表6中转换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外地户籍或农业户籍的劳动力进入一级市场的概率明显较低,另外,劳动力的性别、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也对他们能否进入工作条件和工资待遇较好的一级市场具有显著影响,所以,降低农民工进入一级市场的制度性或体制性障碍,提高他们同等条件下进入一级市场的概率,也是政府降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歧视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蔡昉(1998):《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2. 严善平(2006):《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管理世界》,第8期。
3. Becker Gary S.(1957),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4. Doeringer, P. B. and Piore, M. J.(1971), *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 Lexington, MA: D.C. Heath.
5. Meng Xin(2000), *Labor Market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朱 犁)